

两德统一进程中的“十点纲领”：源起、内涵及其意义

王帅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 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旨在实现两德统一的“十点纲领”。该纲领是复杂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共同催生的产物。同时吸纳“西方政策”与“东方政策”的诸多核心理念, 对四大国权利、波兰与德国奥德-尼斯边界、未来德国的联盟身份等重大问题的规避, 未设定具体的时间表等无不体现“纲领”设计时高超的政治技巧与谋略。“纲领”树立了科尔在国内政治图景中的主导地位, 打破了民主德国可预期的稳定局势, 倒逼国际社会对“德国问题”明确表态, 它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 两德统一; 联邦德国; 科尔; “十点纲领”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3-0183-10

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西德统一, 至今仍是一件令人称奇道绝的事, 可其中跌宕起伏的统一进程一直未在世人面前揭开其历史的面纱。被誉为“两德统一之父”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在柏林墙倒塌19天后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著名的“十点纲领”(Zehn-Punkte-Programm)^①, “纲领”公开吹响了德国统一的号角, 其后的统一进程也在大国协调下进入了加速期。作为统一进程转折点的“十点纲领”不是科尔信手拈来的产物, 它提出的背后存在着极端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环境, 其所蕴藏的内涵也具有多重目标与所指。它之于德国统一的意义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应被忽视的事。研究科尔的十点纲要, 是了解德国在1989年度快速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课题,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内外的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都曾针对两德统一问题做出过细致、深入的探讨^[1], 其中不乏一些水平较高的著作。如利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与国务院档案进行叙事的泽利科与赖斯^[2]、利用联邦德国总理府档案的魏登菲尔德^[3]以及利用法国爱丽舍宫档案及外交部档案的波佐等^[4], 这些著述或多或少地论及了“十点纲领”且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泽利科等在粗略交代“十点纲领”的同时着重分析了美国对纲领“带有疑虑但从整体上支持”的立场^[2](118-125)]。波佐更是惜墨如金, 其著作对“十点纲领”极为简短的分析也许是为了配合全书“从雅尔塔体系终结到苏联解体再到

新欧洲框架的产生”这样一个较大的历史分析框架, 他同时也粗略地分析了法国总统府、外交部、媒体等各部门对“纲领”的不同立场, 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法国面对“十点纲领”时的焦虑心态^[4](122-126)]。德国历史学家魏登菲尔德从联邦德国国内层面重点阐释了联邦总理府提出“纲领”的内部进程, 他对“纲领”出台的目的及其内涵的论述、对“纲领”是一种“纲领”而不是一种“计划”的界定都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3]。亚历山大·帕拉托阐释了苏联在“纲领”形成初期所扮演的“失误的纵容者”的角色^[5]。菲利普·高德纳则分析“纲领”设计时有意忽略第十一点(关于波兰与德国的奥德-尼斯边界)的选举性动机^[6]。

上述关于统一进程及“十点纲领”的相关研究虽不断深化、细化, 但尚存一些历史性不足。首先, 史料运用上具有局限性, 分析的视角往往给人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利用美方档案的泽利科只关注美国对“纲领”的考量, 利用法国档案的波佐只关注法国对“纲领”的反应, 而利用苏联档案的帕拉托也仅分析了苏联在“纲领”出台中的作用, 这些片面的分析视角难以全景式地揭示“纲领”形成的因果联系, 也就难以对其进行准确评判。其次, 正是由于史料选择上的局限, 导致了当前研究集中在关注“纲领”形成的内部因素而忽视了其出台的外部环境。除帕拉托外(也仅部分地叙述了苏联在纲领出台中的作用), 泽利科、魏登菲尔德、波佐等都将国际社会对“纲领”

的反应描绘成被动式的,他们忽视了英、法、美、苏四大国的态度同样也是联邦总理府提出“纲领”的原动力,国际背景在纲领被提出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再次,即便是在对“纲领”形成之内部要素的考察上,既有研究也显得不够深入且价值取向明显。魏登菲尔的著作是迄今为止对“纲领”形成内因交代得最细致、深入和权威的文献(其后探讨内因的论述大多基于魏氏之作)。不过,由于他在科尔的排他性授权下查阅了联邦总理府档案并由此编撰统一史,其著因而被学者们扣上了“官方史”的帽子^[7]。客观地说,这些“官方史”的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魏氏著作并没能进一步挖掘“纲领”背后的选举性策略(菲利普·高德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他简单地认为“纲领”是为了“对外显示团结一致……掌握关于德国问题的舆论主导权”,其之于“纲领”的论述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弥合各党派政治分歧”等歌功颂德式的论调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那些光鲜亮丽言辞背后的外交谋略^{[3](99,108-114)}。最后,既有论著对“纲领”在统一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未曾有过令人信服的历史性评判。研究者们在粗略交代“纲领”的主要内容后纷纷把焦点聚集在联邦德国国内各政治派别以及外部四大国对“纲领”的反应上,未能进一步分析“纲领”提出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更没能将“纲领”置于一个历史分析框架下以赋予其应有的价值。

为了弥补材料单一、视角片面、价值有失中立、论证不足等研究缺憾,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加之一些近年来新解密的外交档案为支撑^②,试图从国内、国外等多个层面全景式地揭示“十点纲领”的形成、内涵及其历史意义,借此拓宽我国对两德统一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并从中进一步借鉴统一经验。

一、“纲领”的源起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后,随着波兰、匈牙利革命以及民主德国国内革命的推进,自1963年第二次柏林危机结束后被长期尘封的“德国问题”重新提上了大国外交的非正式议程。科尔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此时面临的环境是极端复杂和困难的。一方面,享有“德国问题”最终决定权的英、法、美、苏四大国各自都有自己的盘算与考量,不要说让四大国最终放开两德统一的绿灯,就连把“德国问题”从非正式台面提升到正式磋商舞台都是十分艰难的一步。另一方面,即便是在联邦政府内部,各在野党及政治团体对两德究竟

要不要统一以及应以什么样的方式统一也存在着大相径庭的立场,尚且没有任何一种主导性的主张赢得了公众意见。外部大国的不安与警告、国内政治的分歧与竞争已把科尔置于了“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亡”的境地。基民盟的科尔自幼就是阿登纳的追随者,始终将统一作为目标与信念的他显然不愿在这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中沉默地死去,但作为总理,他又不得不顾虑国际与国内各方面的利益诉求。通过对史料的整体性分析,我们认为以下多重考量与动机是科尔提出两德统一一中著名的“十点纲领”的根源。

其一,从联邦德国国内层面看,“纲领”是科尔保持其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必然选择。以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党、奥斯卡·拉方丹和勃兰特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以及一些左翼政党并不赞同科尔关于德国统一的愿景及路线。根舍在9月25日接受《明镜》采访时表示,两德间的统一应该在整个欧洲发展的前提下实现^[8]。勃兰特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甚至表态两德统一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诉求(至少不是现阶段的诉求)^{[9](211)}。他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公开讲话中也强调“我们能够向我们的邻国与超级大国们保证,我们不会寻求任何一种忽视我们对欧洲之和平之义务的、解决我们自身问题的方案……欧共体必须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我们大陆的分裂将缓慢、但注定得到克服”^{[10](80-81)}。拉方丹相信,以科尔为代表的右翼保守派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局面,他和民主德国民众的当下意愿和感受是格格不入的^[11]。其他左翼政党也表示联邦德国应坚持“民主德国的主权并致力于同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展开合作”^{[10](85)}。并且,根舍“通过欧洲进程循序渐进地促进德国统一”的路径看起来已经吸引了公众意见:约1/4的西德民众认为在未来几年内西德仍将定位于西方而东德将独立地面对东方,44%的人相信两德在未来将保持一种类似于西德同奥地利和瑞士一样的亲密关系^{[4](123)}。在此背景下,科尔倘若在“德国问题”上再拿不出周详的计划或全面的战略目标,那么他无疑将在国内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并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失败甚至下台。而他在“纲领”出台进程中严格保密(甚至对他亲密的执政联盟——自由民主党的根舍也选择保密),在“纲领”发表之际又通过议会演说制造轰动效应,无不表明这些计划是为了战胜竞争对手并赢得舆论主导权的。

其二,从民主德国层面看,“纲领”是联邦德国政府煽动民主德国公众情绪、破坏民主德国政权稳定的有效手段。即便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民主德国的国内局势及其走势仍不明朗,民众虽持续不断地走上街

头游行示威，可仍然没有大规模地公开喊出“我们同属一个民族(国家)”的口号。民调与记者采访也表明，东德人更支持东德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而不是与西德合并成一个德国^[12]。西德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发出想要实现统一的明确信号，那么东德老百姓也很难自发地形成一种集体意识。而一旦西德主动向东德人表明姿态，那么深陷经济、债务与失业危机、在柏林墙倒塌后得以目睹东西德生活水平差距的东德民众，根本没有理由去拒绝兄弟张开的友谊双臂。如科尔所言：“东德人与西德人都在仔细地聆听。现在每一个赞同自决或是统一的词汇都是十分重要的。”^[13]另外，东德的统社党在柏林墙倒塌后作出了一系列动作作为回应。据说是在莫斯科的影响下^[14]，改革派的莫德罗迅速接替克伦茨担任东德政府领导人。莫德罗上台不久就提出了对内改革的“五点计划”以及规范两德关系的“条约共同体”(Vertragsgemeinschaft)构想^{[10](81-83)}。统社党政治局的这些积极倡议，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扰、在西德政府又提不出任何具体计划的情况下，极可能凭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游说赢得英、法的支持，并在国际社会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届时，东德政府很可能掌握住两德关系及“德国问题”未来的主动权，它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存在也将越发稳定。一旦错过东德内部的这段动荡不安期，科尔破坏统社党政权稳定、尽快实现两德统一的目标恐怕难再奏效^{[15](41-58)}。

其三，从苏联层面看，苏联态度的暧昧不明与放纵也是科尔敢于公开呼吁统一的主要原因。柏林墙倒塌前，科尔只要在议会或基民盟大会上公开谈论联邦政府想要实现统一，都会面临苏联义正言辞的警告与施压。不过，苏联在发出警告的同时也会留有一些余地：戈尔巴乔夫本人对科尔总是显得非常友好与温和^{[16](515-517)}，这使波恩认为莫斯科根本无意同联邦德国公开决裂并重回冷战。另外，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自由派人物，如雅科夫雷夫、波图加洛夫等，先后在“德国问题”上发表了有悖于苏联官方政策的论调。雅科夫雷夫在访问日本时表示苏联不会像英国和法国那样在德国统一进程中扮演坏人的角色^{[2](117)}。波图加洛夫在同特尔切克会晤时递交给特尔切克一份“手写文件”。文件的第一部分在法林及切尔尼亚耶夫的授权下认可了民主德国国内类似于苏联式的改革进程，但文件的第二部分则暗示在实现德国统一之前有着诸多问题需要考虑，其中包括德国的联盟身份以及一项对德和约，“我们正考虑德国问题的一切可能选项，即便是那些在现实中难以想象的事……苏联甚至可能对一个‘邦联德国’开绿灯”^{[15](43-44)}。“‘绿灯’显然给了

特尔切克底气，而特尔切克当下正在准备起草科尔在11月28日议会的发言稿(也就是以‘十点纲领’为主要内容的发言稿)。”^{[2](118)}

其四，从英、法层面看，“纲领”意在通过主动表达德国人民的统一意愿来抵制英、法的消极声音。柏林墙倒塌后，除了莫斯科之外，英、法都试图使事态冷静并极力将“德国问题”从正式的外交舞台上剔除。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柏林墙倒塌后第一时间与苏联进行了接触，密特朗向戈尔巴乔夫表示“某种均势存在于欧洲，我们不应破坏它……我不认为改变边界的问题能够在当下被现实地提出——至少是在某一阶段内”^{[17](593-594)}。同时，法国还以欧共体轮值主席国的身份于11月18日召集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举行了爱丽舍宫晚宴会议，会议的目的之一便是“传递一种降温的姿态并使那些担心事态过度发展的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放下心来”^③。英国的态度比法国更直接。柏林墙倒塌后第二天，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在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频道发表评论说：“如何以及何时统一，并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18](98)}英国首相撒切尔在爱丽舍宫晚宴上也公开表态：“我们绝不能讨论改变边界的问题，任何讨论改变边界或德国统一的企图都将毁掉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必须保持北约和华约集团不变。”^{[19](793-794)}在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邻国的一片消极声中，德国人如果仍不能够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呼声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那么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德国的未来都将被淹没在欧洲的惶恐与不安中。

其五，从美国的层面看，“十点纲领”在11月28日提出与美国的关系最为密切。11月8日科尔在议会演讲时公开表达了“如果出现了机会，那么联邦德国想要统一”^{[10](74-77)}的态度后遭到了苏联的警告^④。他在11月17日转而求助于美国总统布什。布什考虑到柏林墙刚刚倒塌，苏联集团甚至包括英、法等西方盟友都处于极度敏感中，而且他本人上任之后的首次美苏峰会(12月2日的马耳他峰会)也迫在眉睫，美国在长达半年的东德革命进程中都没有主动为西德出头开罪莫斯科与西方盟友，当下也就显得更加不合适。不过，当科尔主动提出要与布什会晤以“共同应对马耳他峰会”时，布什表示“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之前我绝对有必要从你个人那里得到意见与建议”，他进一步表示“这是重要的，我因而将不会错过德国立场与科尔立场的细微差别”。科尔立即向布什承诺在根舍11月21日访美^⑤后他将在那一周的后半段(23—27日)向美国递交一份代表他个人立场的备忘录(也就是11月28日的备忘录)，并且在11月27日同布什打电话做进一步的讨论^⑥。

科尔主动提出在美苏马耳他峰会之前与布什协调,事实上是担心美、苏在马耳他峰会上有可能拿德国问题做交易,一旦马耳他峰会在德国问题上定下了“维持现状”的基调,那么留给德国人进一步运作的空间也就不大了^{[16](568)}。根据美国一以贯之的支持德国的立场,布什欣然答应了科尔的提议并要求他详细阐明德国政策^⑦。这也就是“十点纲领”在马耳他峰会前出台的原因。不过,布什与科尔达成的口头约定是在私下里讨论科尔本人关于德国问题的立场,布什应该没有料想到科尔会在没有同他商量的情况下就发出他关于如何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总理府之所以严格保密,就是为了在翘首以待的国内民众和欧洲邻国中制造出“巨大的反响”。

二、“纲领”的基本内涵

出于上述多层考量,1989年11月28日早上的联邦议院财政预算辩论会议上,科尔在未同联邦德国各党派以及外部各大国商讨的前提下^⑧,将总理府秘密准备好的关于如何实现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在议会作了公开陈述^⑨。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科尔的演讲获得了基民盟-基社盟、自由民主党与社会党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纵观“纲领”从设计到出台的过程,它的基本内涵与所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向整个世界明确传达了联邦德国的统一意愿与统一决心,并且表明了最终的统一形式是“联邦德国”而不是“邦联德国”。科尔在发言中多次动情宣称联邦德国想要改变现状并最终实现统一。他强调当下正处于“欧洲以及德国历史新篇章的发端——一个带领我们超越现状、超越欧洲迄今为止现存的政治架构的新篇章”^{[9](239)}。“纲领”第五点明确表示“我们同样准备采取进一步的决定性步骤……并最终形成一个德意志联邦”,“如今没有人知道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以何种形态出现。我确信,如果德国人民想要统一,那么统一便会实现”^{[9](241-242)}。第十点中科尔进一步表示“我们正致力于欧洲的‘和平秩序’,德意志民族能够在此秩序下通过民族自决的方式重新恢复统一。重新统一,重新获得民族统一,仍是联邦政府的政治目标”^{[9](244)}。

第二,旨在通过“主动设定两德关系的发展议程”来实现德国统一。所谓设定两德关系的发展议程,是指首先由西德对东德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医疗援助”来解决当下迫在眉睫的难民危机与东德危机(第一点)^{[9](239)};随后“联邦政府将在所有领域与民主德国政

府展开合作,这将直接惠及边界两边的民众”(第二点)^{[9](240)};接着,在东德推行民主化选举的前提下(第三点)^{[9](240-241)},联邦德国愿意接受莫德罗的“条约共同体”,因为“两个德国之间的亲密与特殊关系需要一张在所有领域和所有层面都更为紧密的协作网”(第四点)^{[9](241)};最后,“条约共同体”并不是两德关系议程的终点,联邦德国“将在两德之间发展一种‘邦联结构’(konföderative Strukturen)并最终形成一个德意志联邦(Föderation)”(第五点)^{[9](241-242)}。

科尔的统一路径既有条件地承认了东柏林的“条约共同体”方案,又显然超越了这一方案。从“条约共同体”到“邦联”再到“联邦”,意味着两个德国的主权边界逐步消融并最终高度融为一体。莫德罗提出“条约共同体”的目的就是将两个德国的主权固化,他甚至没敢提出“邦联”这一概念。科尔明白,任何一种邦联模式都存在着使两个主权国家并存于一个国家联盟之内的风险^{[3](106-107)},因而“纲领”不仅需要超越“条约共同体”,而且还要超越“邦联”带来的限制,在智囊团队的帮助下,“纲领”用一个较为模糊的“邦联结构”的概念代替了“邦联”。

总的来说,科尔在两德如何实现统一的路径设计上是极富谋略且成功的。其一,没有公开挑战东德提出的、苏联支持的“条约共同体”方案,只是给这个方案设定了一个东德政权无法接受的条件——民主化选举并放弃权力垄断,这是一种表面上支持实际上给予否定的做法。其二,避免了在路径设定上围绕“邦联”这一概念做文章,从而也就避免了两个主权国家共存于一个国家联盟体系之下的“名义上的统一,事实上的分裂”的结果。其三,“邦联结构”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这种模糊性给了联邦德国进一步界定它的自由空间。如果国际社会极力反对“邦联结构”,那么联邦德国可以将它界定成与“邦联”等同或类似的概念;如果国际社会的容忍度较高,那么这一概念显然是可以指向“联邦”的。

第三,继承“西方政策”中“以实力求转变”的核心理念,通过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强迫民主德国改革其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纲领”第三点宣称,“如果民主德国能够决定保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推行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并使这些改革的进程不可逆,那么我将提供全方位的援助和合作。‘不可改变’的意思是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必须同反对派群体就修改宪法以及拟定一项新的选举法案达成协定……必须废除统社党的垄断权力……只有在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之后经济援助才会落到实处……只有当民主德国对西方开放投资、为市场经济创造条件、并激活私人企业时经济才

能够复苏”^{[9](240-241)}。科尔通过这一手段事实上是想要将长期敌视西德政府并牢牢依附于苏联阵营的东德政权彻底摧毁。不论东德选出的将是一个社会党政权，或者更好的情况是一个东-基民盟政权(正如历史发展的那样)，苏联对东德的全方位控制将极大地被削弱，两个德国统一的内部阻力也将大幅减小。所以，戈尔巴乔夫在“十点纲领”提出后极力斥责联邦德国的理由也主要围绕着这一点展开，他把这种主动干涉东德内政的做法看作是“强加于一个主权国家头上的最后通牒”^⑩。

第四，吸纳“东方政策”中“全欧进程”与“和平秩序”等概念，把两个德国内部关系的发展置于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之下。历史经验告诉科尔，联邦德国难以单凭“西方政策”或单单通过改变两德关系来实现德国统一，统一必须“与苏联一同去解决它，而不是将苏联排除在外或是反对它”^[20]。“纲领”第六点指出，需要将“两德关系的发展嵌入泛欧进程以及东西方关系的框架之中，德国未来的架构必须贴合整个欧洲的架构。为了实现这一点，西方公正、持久的欧洲‘和平秩序’应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科尔进而将这种欧洲“和平秩序”与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大家庭”理念结合起来^{[9](242)}。第八点、第九点则阐释了欧洲进程与东西方关系的两个核心外在表现：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KSZE)进程在当下以及未来仍是泛欧架构的内核且应给予有力发展”^{[9](243)}；另一方面，维护东西方关系、克服欧洲分裂的基本要件便是“深远且持续地推动裁军与军备控制的步调”^{[9](244)}。

需要指出的是，“纲领”着墨于全欧进程的关键——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不仅是为了贴合苏联的安全理念并展现欧洲与苏联协同共进的意愿，而且也是为了强调《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中明文确立的“允许通过和平方式变更欧洲边界”条款。这主要是因为科尔非常担心英、法想要利用冻结波、德奥德-尼斯边界的机会顺便也将两德的内部边界冻结起来^⑪，这便是他在“纲领”第八点着重强调欧安会、强调《赫尔辛基最终法案》的主要原因。

第五，强调欧洲共同体(EC)在吸引东欧改革国家中的作用但并不承诺如何进一步建设欧共体。“纲领”第七点指出，“欧共体当下必须对中欧、东南欧的改革国家保持开放与弹性。需指出的是东德也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欧共体没有权利使它自身终结于易北河，它必须朝向东方保持开放……当中欧、东、南欧国家达到了相关的先决条件，我们也应该欢迎它们加入欧洲理事会”^{[9](243)}。对于如何加强欧共体的建设，

“纲领”仅一语带过：“我们想要进一步增强它。”^{[9](243)}在欧共体发展方面的发言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提醒欧共体成员国东德入盟决不能成为两德统一的绊脚石，不能出现两个德国已经实现统一而其东部地区却不能加入共同体的局面，无论是法理上还是现实中这都是无法接受的；二是有意淡化欧共体发展方向，意在向欧洲表明，德国统一与共同体如何被发展并不存在关联，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不过，联邦德国有意愿去加强欧洲建设(也仅是意愿)。在欧共体方面的这些言论使得视欧洲建设为核心利益的法国担忧“虽然科尔提到了欧洲共同体的吸引力，但他并没有提及它的政治意图”^{[4](125-126)}，密特朗总统在与根舍会谈时更是严肃地提醒他“只有当德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欧洲共同体，它才有希望实现统一”^{[21](58-59)}。

第六，为了避免陷入为时过早的不利争论，“纲领”有意搁置了与统一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议题。除了欧共体、欧安会、裁军等外交政策方面的议题，四大国在“德国问题”上的滞留权将如何被处理、波兰与德国奥德-尼斯边界将如何被解决、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归属究竟如何等，也是联邦政府绕不开的问题。“纲领”在设计时明显忽略了这些“绕不开”的问题并因此遭致四大国与国内政党的广泛批评^{[3](111-134)}。但既然是“有心”忽略，其背后一定蕴藏着外交谋划与策略：其一，“纲领”刚刚喊出了德国人的统一诉求，如果同时也事无巨细地规划好与统一相关的各种细节，这将给国际社会留下一种德国人自行其是、缺乏磋商的印象，“纲领”也就很可能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其二，美苏之间非常明白，解决德国问题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德国未来的联盟归属，联邦德国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那么也就意味着它在统一议题还没有正式登上外交舞台之前，就已经选择了站在一方毫不妥协地对付另一方。这势必将引起美国或苏联的强烈反弹，统一很可能还没开始便已终结。其三，对奥德-尼斯边界的忽略更多的是为了国内选举政治的考量。科尔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要从实质上挑战奥德-尼斯边界，只不过在1989年这个“德国大选年”，被驱逐出波兰领土的那些“被驱逐者们”占到了基民盟-基社联盟党成员的15%之多，并且也是“联盟党选民的最大构成部分”^{[6](11)}。那些极右翼分子以及要求恢复1937年边界的共和党人(Die Republikaner)已经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德国7%的选票^⑫，“科尔作为一个大的人民政党的主席，需考虑整合联盟党内的所有政治派别与各翼政党”^[22]。

三、“纲领”的意义

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并没能威慑住联盟党人对统一信仰的持续追求,科尔在统一尚未被提上国际政治议程时,便已开始讨论如何让统一发生,整个欧美一片哗然。虽然四大国随即作出了新一轮的政策调整以应对联邦德国的正式统一诉求,但“纲领”自提出之日起就已从实质上改变了联邦德国国内、欧洲大陆以及跨大西洋两岸的政治图景,它已不再是单单几句“如果德国人想要统一那么统一就会到来”的口号。“纲领”之所以被视为两德统一进程中的一次转折点,是因为它具备了下述重要积极意义。

第一,“纲领”将科尔重新置于联邦德国国内政治竞争的领先地位,这保证了联盟党能够继续统合各方力量推进其一以贯之的统一政策。自由民主党人根舍在11月所获得的民众好感因科尔的统一计划受到了挫败。科尔不但吸纳了根舍“将两德关系的发展置于欧洲背景之下”的外交政策主张,而且还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统一以及如何实现统一等具体目标,这就使整个联邦德国进入了一种看起来符合逻辑的语境——那些要是不同意科尔政见的人就是反对德国实现统一的人。根舍虽无奈地警告称不能将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作为竞选的议题,但不得不对科尔的“伟大”发言表示祝贺并宣称支持其计划^{[3](112)}。就在总理府密谋“十点纲领”的同时,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党团事实上也已经开始出现了建立一个“邦联德国”的想法,但这些可能抓住主动权的讨论很快就被“纲领”抛在了后面。虽然勃兰特、拉方丹等人出于竞争考量依然对“纲领”提出批评,但社会民主党显然已从攻势转变成为守势。联邦德国的主流媒体也纷纷赞赏科尔敢于采取主动^{[3](112-113)}。特尔切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总理已接过了德国问题的舆论主导权。”^{[15](58)}

第二,“十点纲领”首次把解决“德国问题”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升华到具体的政策^⑤。自“德国问题”产生起,联邦德国解决“德国问题”、实现德国统一的基本立场都以相当抽象的概念呈现,如阿登纳的“以实力求转变”以及勃兰特的“通过相互接纳求转变”,这些政策没有阐释两个德国将通过什么样的官方政策最终达成什么样的统一形态。而“纲领”首次“弥合了联邦德国抽象的统一意愿与积极完成统一目标之间的鸿沟”^{[7](875)},可以说,科尔把统一从一种言语上的概

念转变成了具体的政策^{[3](95-109,640)}。并且,这一具体的政策也没有脱离联邦德国传统的统一理念并另起炉灶:它在继承“小步子政策”^⑥的基础上广泛吸纳了社民党“东方政策”的核心要义,如“泛欧进程”和建立“欧洲和平秩序”等,这就有效地维护了勃兰特时期业已种下的“东方政策”的果实,确保了“从口号到政策”转变过程中的环境稳定并为政策落实奠定了基础。

第三,“纲领”使“德国问题”从国际政治中的非正式话题转变为严肃性议题,这倒逼国际社会不得不对“德国问题”进行明确表态。柏林墙倒塌后,英、法等欧洲大国都想要使德国统一的热情消退并将“德国问题”冻结在欧洲外交舞台。密特朗的态度已然从11月3日的“我不担心德国重新统一”^{[18](98)}转变为11月18日的“这是一个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的问题”^{[4](118)}。撒切尔更是在爱丽舍宫晚宴上带头反对统一^{[19](793-794)}。“纲领”提出后,国际舞台上的根舍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根舍与撒切尔会晤、根舍与密特朗会晤中都以“十点纲领”作为中心议题展开^⑦,冰冻“德国问题”的企图事实上已然失败。如今,要么旗帜鲜明地继续反对统一,要么有条件地给予积极支持,很难找到在这两种对立选项之外的“无视德国问题、回避德国问题、搁置德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在西方阵营中,撒切尔显然选择了前者,她继续警告根舍“欧洲的领土现状一旦出现变更,将会打开潘多拉之盒”。而美、法则选择了后者,美国提出了有条件支持统一的“四项原则”,密特朗则表示“只有当德国支持一个强有力的欧共体,它才有希望实现统一”。正是在看清盟友立场的基础上,科尔才在1989年12月及1990年1月推行了满足美、法条件并孤立英国的策略。这是德国统一能够成功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第四,“纲领”成功引燃了民主德国民众的统一热情,并有效地损害了莫德罗政府苦苦支撑的合法性根基。民主德国老百姓从科尔的演讲中看到了联邦德国官方乐见统一的姿态以及短期内实现统一的可能^{[3](94-110)},在“纲领”的煽动下,东德民间集体意识很快从推翻统社党领导并建立一个民选、独立的东德政府转变为建立起民主的东德政府并努力实现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街头的游行群众也都纷纷喊出了“我们同属一个民族”的口号^⑧。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众游行的轮番冲击下,东德的经济、社会陷入极度混乱,莫德罗的政策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他的那些在欧洲大国眼中能够稳定住东德局势的积极倡议(条约共同体)却难以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失去合法性的统

社党政权也失去了与联邦德国讨价还价的资本，它不得不接受联邦德国“把经济援助与自由选举挂钩”的要求，而正如科尔所相信的，一个民选的东德政府必将选择统一^{[2](110)}。

第五，“纲领”体现的高超的政治技巧与谋略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纲领”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忽略显然不是敏锐的科尔及其智囊团的无心过错。科尔与特尔切克深信，那些与德国统一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是实现德国统一道路上最大的阻力，草率地亮出立场底线极可能将联邦德国置于非常被动的局面，搁置这些问题无疑将赋予其较大的运作空间。比如，波兰担心奥德-尼斯边界无法解决，德国就用确定的边界换取波兰对统一的认可(尽管回避边界问题更多的是为了选举政治)。法国担心欧洲一体化建设得不到保障，德国就用法国一心想要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获取法国在统一上的中立。美国忧虑德国不对未来的联盟身份表态，德国就适时地保证统一后的德国将加入北约来换取美国的全力支持。

那些认为科尔回避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害怕“纲领”提出后可能会遭致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的观点也是有误的。科尔在“纲领”公布的前一天，还向密特朗写信释放出德国想要延缓欧洲建设的信号^①，他并不惧怕欧洲大国(至少是英、法)的负面反应。相反，欧洲邻国越是担心联邦德国在“德国问题”上独自越走越远，那么联邦德国将来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的妥协也就越显得牺牲巨大，这是典型的“以退为进”的策略。搁置重大分歧、向利益攸关方释放出强硬立场等组合拳巧妙地科尔赢得了“花钱买东西的权利”。联邦德国从口袋里掏出的那些它原本就不得不掏出的东西，在四大国眼中却弥足珍贵。

四、结语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整个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在了德国。自1963年第二次柏林危机后被尘封的“德国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两个德国的未来究竟如何、二战后被人割裂的民族国家是否有机会实现重新统一、欧洲的雅尔塔体系是否应重新调整等重大问题迫切地需要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给出答案。面对这些问题，联邦德国国内的各政治派别却深陷意见分歧，而民主德国的统社党政权已率先提出了规范两德关系的新倡议。没有准备好接受重新统一的欧洲国家试图回避德国问题，而雅尔塔体系的捍卫者苏联却左右摇摆、

举棋不定。西方联盟的领导者美国认为联邦德国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他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些国内外局势的促动下，总理府在11月下旬秘密拟定了一份表明联邦政府立场的全面的纲领性文件——“十点纲领”。

“纲领”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关键时刻向世人展示了德国人的统一决心并具体设定了实现统一的路径。它既继承了“西方政策”传统迫使东德统社党下台，又吸纳了“东方政策”理念把统一置于东西方关系的外部大框架下。在处理与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上，“纲领”在利益冲突不严重(没有美苏参与)的欧共体领域适当释放出了外部议题不能阻碍统一的自信，在国内外利益分歧较大的边界、联盟身份等领域又保持缄默以争取后期的协商空间。“纲领”将联邦德国雄心勃勃但又谨小慎微的立场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其主要内容与中心段落都取自于《基本法》《德国统一简明备忘录》(Brief über die deutsche Einheit)^②以及联邦总理的早期演说等^{[3](109)}，但把这些“陈词滥调”重新组合并在这样一个时机出人意料地和盘托出，本身就是勇气和智慧的象征。

“纲领”使科尔树立了国内权威并保证了联盟党的政策连续性，它帮助联邦政府认清了国际社会对统一的真实态度，其所体现的高超的政治技巧与谋略为联邦德国的进一步行动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虽然“纲领”的提出确实是到了联邦德国不得不提出点什么的时候，但它所产生的重要意义并不影响其成为统一道路上最关键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最重要的目标计划。没有“十点纲领”也就没有两德间的快速统一之路。

然而，民主德国却是“十点纲领”冲击下的最大牺牲品。尽管统社党政权先于联邦德国提出了稳定局势的规划，但面临国内深度的经济与债务危机，又得不到华约阵营的外部帮助，计划的推行缺乏物质基础，因而不受受制于联邦德国苛刻的援助条件并被迫接受一个没有设定具体时间表，同时又将民主德国自身计划囊括在内的、西德版的纲领计划。“纲领”提出后，民主德国便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一心想要吞并它的联邦德国之手，其结果注定是悲剧的。联邦德国在1989年底推行的坐视民主德国经济崩溃、煽动民主德国民众情绪的“大步子政策”逐步将民主德国推向了覆灭的深渊。

注释：

① Programm 这一德文词既有计划的意思，又有纲领的意思，在

此将其译为“纲领”，主要参照了魏登菲尔德的观点：“提到的各点都没有确定时间期限……科尔演讲的内容完全是有意识地作为纲领而不是作为计划进行构思的。”“十点纲领”的一大特点就是并没有设定一个较为具体的时间进度表，而仅作为一种目标性质的纲领性文件。笔者对此认同。国内学者欧阳甦首次将其准确地译为“十点纲领”。参见 Werner Weidenfeld, *Aussenpolitik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ie Entscheidungsjahre 1989/90*,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8, S. 110; 中文版见[德]维尔纳·魏登菲尔德等著(欧阳甦译):《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 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第84页。

- ② 主要有 Aleksandr Galkin und Anatolij Tschernjajew Hrsg.,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die deutsche Frage: Sowjetische Dokumente 1986-1991,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以下简称 MGDF: SD); Patrick Salmon, Keith Hamilton and Stephen Roberttwigge eds., *German Unification 1989—1990: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3, Volume7*, London: Routledge, 2009;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and Vladislav Zubok eds.,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以下简称 MH: PECWIE); Andreas Hilger Hrsg., *Diplomatie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okumente des Auswärtigen Amtes zu den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1989/90*,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以下简称 DAAD).
- ③ 11月14日杜马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表明, 法国召开11月18日爱丽舍宫晚宴的目的之一便是“使莫斯科放心”。参见 Frédéric Bozo (translated by Susan Emanuel), *Mitterr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German Unification*,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2005, p. 151, note 29.
- ④ 关于苏联在柏林墙倒塌前后对德国统一的系统性态度可参见, 王帅:《1989年民主德国危机与柏林墙的倒塌: 苏联的反应》,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6年第2期。
- ⑤ 与科尔相比, 不论是在苏联人面前还是在美国人面前, 根舍在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都要保守得多。德方记录参见 *Fernschreiben der Botschaft Washington vom 22. November 22 1989 über das Gespräch von Bundes außenminister Genscher mit US-Präsident Bush am 21. November 1989*, Nr. 8, DAAD,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S. 43-46; 美方记录参见 *Meeting with Foreign Minister Hans-Dietrich Gensche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ovember 21, 1989, The Oval Office*, pp. 1-3, *Memcons and Telcons in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files/memcons-telcons/1989-11-21--Genscher.pdf>
- ⑥ 美方记录参见 *Record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George H. W. Bush and Helmut Kohl, November 17, 1989*, No. 105, MH: PECWIE, pp. 595-597; 德方记录参见 *Telefongespräch des Bundeskanzlers Kohl mit Präsident Bush, 17. November 1989*, Nr. 93, im Hanns Küsters, Daniel Hofmann,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utsche Einheit Sonderedition aus den Akten des Bundeskanzleramtes 1989/90*,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1998(以下简称 DESE), S. 538-540.
- ⑦ 泽利科错误地认为“布什对波恩的政策感到满意, 且并没有向科尔总理施压要他阐明对德国未来的设计方案”。参见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4.

- ⑧ 联邦总理府仅在公布“十点纲领”的当天才将包含“纲领”的信通过特别渠道传送到白宫(其他三大国均没有通知)，“十点纲领”在全世界都获知之后才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到达白宫, 美国官员对这种缺乏磋商的行为感到愤怒, 因为布什总统凡事总是一丝不苟地同科尔事先磋商。科尔给布什的信参见 *Schreiben des Bundeskanzlers Kohl an Präsident Bush, Bonn, 28. November 1989*, Nr. 101, DESE, S. 567-573; 美国方面的最初反应参见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08, note 56.
- ⑨ 关于“十点纲领”的完整内容可参见 *Zehn-Punkte-Programm von Bundeskanzler Kohl vom 28. November 1989*, Nr. 56, MGDF: SD, S. 236-245; Kohl's Ten-Point Plan for German Unity, 28 November 1989, Document 14, in Konrad Jarausch and Volker Gransow eds., *Uniting Germany: Documents and Debates, 1944-1993*,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4, pp. 86-89; *Schreiben des Bundeskanzlers Kohl an Präsident Bush, Bonn, 28. November 1989*, Nr. 101, DESE, S. 572-573.
- ⑩ 德国外交部档案参见 Vermark de D 2, Kastrup, vom 6. Dezember 1989 über das Gespräch von Bundaußenminister Genscher mit dem Generalsekretär Gorbacev am 5. Dezember 1989 in Moskau, Nr. 13, DAAD, S. 73-80. 苏联档案参见 *Gespräch Gorbacevs mit Bundaußenminister Genscher am 5. Dezember 1989*, MGDF: SD, S. 254-265. 苏联档案英文版参见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ikhail Gorbachev and Hans Dietrich Genscher, December 5, 1989*, No. 112, MH: PECWIE, pp. 653-656.
- ⑪ 12月12日科尔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时亲口向他做了如此解释。参见 *Gespräch des Bundeskanzlers Kohl mit Außenminister Baker, Berlin (West), 12. Dezember 1989*, Nr. 120, DESE, S. 639.
- ⑫ https://de.wikipedia.org/wiki/Die_Republikaner-1985-1994:_Die_Zeit_unter_Franz_Sch.C3
- ⑬ 这一观点首先由魏登菲尔德提出, 斯波尔同样认为“十点纲领”是一项“计划”(plan)而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concept)。参见 Werner Weidenfeld, *Aussenpolitik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ie Entscheidungsjahre 1989/90*,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8, S. 95, 109; Kristina Spohr, “German Unification: between Official History, Academic Scholarship, and Political Memoirs”,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43, No. 3, September 2009, pp. 874-875.
- ⑭ “小步子政策”主要是指通过与民主德国渐进协商的方式来逐步实现联合, “纲领”中在如何实现统一上采取的就是这种渐进的方式。不过, 从1989年12月开始, 联邦德国逐步放弃了“小步子政策”, 进而转变成一种加速民主德国灭亡的“大步子政策”, 可见“纲领”中体现的渐进协商之精神也只是权宜之计。
- ⑮ 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参见: 德国外交部档案 Vermark de D 2, Kastrup, vom 6. Dezember 1989 über das Gespräch von Bundaußenminister Genscher mit dem Generalsekretär Gorbacev am 5. Dezember 1989 in Moskau, Nr. 13, DAAD, S. 73-80. 苏联档案参见 *Gespräch Gorbacevs mit Bundaußenminister Genscher am 5. Dezember 1989*, MGDF: SD, S. 254-265. 苏联档案的英文版参见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ikhail Gorbachev and Hans Dietrich Genscher, December 5, 1989*, No. 112, MH:

- PECWIE, pp. 653–656. 与撒切尔会晤参见 Vermerk des bundesdeutschen Botschafters in London, von Richthofen, 1 vom 30. November 1989 über das Gespräch von Bundesaußenminister Genscher mit der britischen Premierministerin Thatcher am 29. November 1989, Nr. 10, DAAD, S. 50. 与密特朗会晤参见 Niederschrift des bundesdeutschen Botschafters in Paris, Pfeffer, 1 vom 30. November 1989 über das Gespräch von Bundesaußenminister Genscher mit dem französ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Mitterrand am 30. November 1989 in Paris, Nr. 11, DAAD, S. 58–59.
- ⑩ 伊丽莎白·庞德以及承袭引用庞德论著的詹姆斯·迈克亚当斯都错误地将科尔的“十点纲领”看作是为了使德国统一放慢脚步并且使情绪冷静的手段, 尽管庞德在她随后的专著中修正了这一观点。参见 Elizabeth Pond, “A Wall Destroyed: The Dynamics of German Unification in GD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2, (Fall 1990), p. 57; A. James McAdams, *Germany Divided: From the Wall to Reunific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5; Elizabeth Pond, *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p. 137.
- ⑪ 特儿切克认为科尔给密特朗的信的姿态是积极的, 至少表示德国“没有忽略欧洲一体化政策”。参见 Horst Teltschik, 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1, S. 54. 科尔给密特朗的信参见 Schreiben des Bundeskanzlers Kohl an Staatspräsident Mitterrand, Bonn, 27. November 1989, Nr. 100, DESE, S. 565–566.
- ⑫ 在 1970 年签订标志着苏德和解的《莫斯科条约》时, 在联邦德国的要求下, 在该条约之后附上了《德国统一简明备忘录》, 《备忘录》重申了联邦德国对于柏林以及德国统一的持续追求。参见 W. R. Smyer, *From Yalta to Berlin: The Cold War Struggle over German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p. 237.
- ⑬ Kristina Spohr. German unification: Between official history, academic scholarship, and political memoirs[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009(3): 869–888.
- ⑭ Von R. Kiessler, D. Koch. Hier ist Engagement gefordert[J]. *Der Spiegel*, 1989(9): 24–27.
- ⑮ Aleksandr Galkin, Anatolij Tschernjajew. Michail Gorbatschow und die deutsche Frage: Sowjetische Dokumente 1986–1991[M].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 ⑯ Konrad Jarausch, Volker Gransow. *Uniting Germany: Documents and debates, 1944–1993*[M]. Oxford: Berghahn Books, 1994.
- ⑰ A. James McAdams. *Germany divided: From the wall to reunification*[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206.
- ⑱ Elizabeth Pond. *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M].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135.
- ⑲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Chancellor Helmut Kohl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November 29, 1989[C/OL] Memcons, Telcons. George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1989-11-29) [2018-04-15].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files/memcons-telcons/1989-11-29--Kohl.pdf>
- ⑳ Elizabeth Pond. A wall destroyed: The dynamics of German unification in GDR[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0(2): 44.
- ㉑ Horst Teltschik. 329 Tage, Innenansichten der Einigung[M]. Berlin: Siedler Verlag, 1991.
- ㉒ Hanns Küsters, Daniel Hofmann. *Dokumente zur Deutschlandpolitik: deutsche Einheit Sonderedition aus den Akten des Bundeskanzleramtes 1989/90*[M].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1998.
- ㉓ Svetlana Savranskaya, Thomas Blanton, Vladislav Zubok. *Masterpieces of history: The peaceful end of the cold war in Europe, 1989*[M].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㉔ Patrick Salmon, Keith Hamilton, Stephen Roberttwigge. *German unification 1989–1990: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series3, volume7*[M]. London: Routledge, 2009.
- ㉕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M].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1993.
- ㉖ Manfred Uschner. *Die Ostpolitik der SPD*[M]. Berlin: Dietz, 1991: 182–210.
- ㉗ Andreas Hilger. *Diplomatie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okumente des Auswärtigen Amts zu den deutsch-sowjetischen Beziehungen 1989/90*[M]. München: Oldenbourg, 2011.
- ㉘ Karl-Rudolf Korte. *Deutschlandpolitik in Helmut Kohls Kanzlerschaft: Regierungsstil und Entscheidungen 1982–1989*[M].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8: 470.

参考文献:

- [1] 王帅. 两德统一的外交史: 史料、论争与前景[J]. *世界历史*, 2016(4): 105–116.
- [2] Philip Zelikow,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Werner Weidenfeld. *Aussenpolitik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Die Entscheidungsjahre 1989/90*[M].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98.
- [4] Frédéric Bozo. *Mitterr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German unification*[M].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2005.
- [5] Alexander von Pla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ush, Kohl, Gorbachev,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Germa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76–81.
- [6] Philipp Goldner. *Helmut Kohls Zehn-Punkte-Programm und der “fehlende elfte Punkt” (die Anerkennung der Oder-Neiße-Linie als Westgrenze Polens)*[M]. München: GRIN Verlag GmbH, 2006.

“Zehn-Punkte-Programm” in the process of German reunification: its origin,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WANG Shu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in 1989, FRG's Chancellor Helmut Kohl unexpectedly put forward the “Zehn-Punkte-Programm” which aimed at achieving German reunification. The plan, deriving from the complex environment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bsorbed at the same time many core philosophies from both Westpolitik and Ostpolitik, evaded such major issues as “rights of Four Powers” “Polish-German border” and “alliance membership of future German”, and did not set specific timetable for the reunification. All these reflected the superb political skills and strategy of Kohl. “Zehn-Punkte-Programm” established a national authority for the CDU's Kohl, diluted the stability of GDR, resisted powerfully the European neighbors' hesitation and opposition, and shaped a favo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FRG's further actions. It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road of rapid reunification of Germany.

Key Words: German reunificatio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Kohl; “Zehn-Punkte-Programm”

[编辑: 苏慧]

(上接第 48 页)

On the normative meaning of “minor” in criminal law

HU Pingren, DENG Xujian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relevant stipulations about “minor” in both Article 261 in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rticle 60 i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the academia in China has done little research on the word “minor”. In legal application, the value of “minor” is ignored and it is often mixed up with “juveniles”, which hinders both the 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law in our country. As for the definition standard of the protected group “minor”, it is necessary to lay emphasis on the duration of maintenance obligation of an elder to his children or grandchildren. Perception, memory and expression are the three stages in the formation of witness testimony. In qualifying a minor witnes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se three elements is also necessar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wording of the provision of Article 60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not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or properly express themselves” be changed to that of “fail to distinguish or express the facts to be proved”. At the same time, by referring to other countries' definition of “minor” witness, we can partially abandon the statutory standards in China, and tend to define minor witness by means of doctrine of judgment, moderately blurring the age limit. In this way, certain authority is given to China's judiciary group to check whether “minors” are qualified as witness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legal theory as well as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judicial practice to maturity.

Key Words: the “minor” group; the witness qualification; principle of legality; doctrine of judgment

[编辑: 苏慧]